**中国模式下经济的平稳转型**

——关于我国体制结构转变的逻辑与路径

2021200672 刘雯菲

摘要：中国经济体制结构转变经历四十多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本文细数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历程和路径选择，体现每阶段重大的政策决议及其意义，从历史中抽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内在逻辑和中国智慧。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时代重大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发展新格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成为必然要求。因此回顾平稳转型的基本轨迹，总结经验教训，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模式 实践历程 全面深化改革 逻辑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的体制结构转变是指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过程。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结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从最初坚持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在转型的艰辛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索试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形成了“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创下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我们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成功平稳地转为充满活力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顾过去四十多年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与逻辑，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也是立足现有的改革经验成就，从而总结经验启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更好的思路。

一、经济体制结构转变的路径选择和实践历程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受苏联模式和冷战背景影响，我们完全排斥市场。不可否认，这种体制对于我们推进工业化，集中有限物资和力量投入经济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体现着我们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又追求国家独立和经济安全的愿望，同时对于我们如今的经济体制有启发意义。但随着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显露和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党中央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面对七十年代的市场化浪潮，我们国家着手启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从经济领域的探索扩展到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中国模式下经济的转型经历多个发展阶段，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第一阶段：1978——1984年，改革开始，局部试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随之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中国当今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政府应该放权。我们要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地方和企业管理的自主性，以此来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并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领导地大胆放权”成为这一时期地重要措施。

陈云在当时大胆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个部分”的思想，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仍以计划为主。下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解释，提出“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党的十二大上，中央构建起“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框架，明确划分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边界范围。这时期的改革还是分散、局部的，但前期的探索与尝试为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指向与路径选择提供了很多借鉴。

改革首先从中国经济发展较薄弱的农村开始，我国农村改革看起来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但其中却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安徽、四川率先开展农村改革，进行“包产到户”，后来国家根据这两个省份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其他省份也纷纷开始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最终我们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原先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改革逐步深化并出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大好形势。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的焕新带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反过来又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城市里，随着城市经济改革和企业扩权改革的发展，在原有放权让利的基础上，国家做出调整，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次突破，经济责任制和新的财政体制也随之而来。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国家劳动力就业问题，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变革的重要内容。

这一阶段，我们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允许各地各领域开展试点，在实践中检验和争论，运用试点的事实进行判断。我们依据人民需要和农村和城市改革现状事实，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未来发展，有了一定的思路。

（二）第二阶段：1984——1992年，全面改革新时期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原则，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面改革的新时期。《决定》根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作出规定，对许多重大问题都做出了说明和部署，其中就包括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建立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增强企业活力等内容，提出了关于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它创造性地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计划与市场得关系方面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冲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对于这个决定，邓小平和陈云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决定》通过之后改革全面推行，关于如何更好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1985年，有学者提出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构想，同时，后续产生了关于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谁为主线的问题。

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大重点，如果想要调整、改革计划经济，不进行价格改革是不现实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后，许多学者经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被中央接受。随后国家完全放开了生产资料计划外的价格，标志双轨制正式实行。首先从石油价格开始，逐渐扩大到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一部分消费品价格。在初期阶段，国家以调为主，并选择放开影响比较小的商品价格，增加它们的供应量；中期阶段“放”转为重点，生活品、农副产品的价格逐一放开，交给市场；后期以调整为主，除了少数价格外其余大多都由市场来调节。在实行的过程中，这一制度慢慢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但双轨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出现倒卖、腐败等严重问题，在社会舆论等各种原因交织下，领导人决定加快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加速“价格闯关”，解决价格改革问题。这却引发抢购风波和银行挤兑风波。最终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暂停方案，“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

后来，国家又出台一系列整顿经济秩序的措施，强化监督和管理，对企业加强整顿，减少乱象的发生；逐步减少实行价格双轨制的商品，对于短期内无法取消的，严格管控商品需求，采取措施缩小计划内外的价格差……经过几年的整顿，经济明显降温。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年之后进行了多次价格调整，某些产品计划外价格甚至低于计划内价格，计划外市场有了较大发展，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自然而然朝着市场价格方向。总的来说，虽然双轨制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混乱，但价格双轨制作为我国经济转变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我们从计划价格模式向市场价格模式转变的过渡中有着重要意义。

在城市中，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核心，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等环节展开。经过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国企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企业经营思想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放型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向增强企业活力方向转变、领导人向经营性转变、组织多元化等。但是在这个阶段中的国企“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仍然没有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国企还是无法真正成为可以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

在这个阶段里，农村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并出现了大批新型的小型城镇。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到：“农村经济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统购派购制度最终也被取消，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再次遭遇意识形态困境。我们围绕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论，计划与市场到底能不能结合，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这些争论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我国愈演愈烈，国内对市场经济的攻讦也多了起来，我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

（三）第三阶段1992——200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1992年1月至2月期间，邓小平先后在武昌、深圳等考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称之为“南方谈话”。这是他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最为系统的论述，态度明确，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认识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鼓励人们大胆试、大胆闯，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的论述消除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化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认识误区，在关键时刻再次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顺利变革。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理论与实践上的又一次伟大创造。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对社会主义以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根本深化。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制度性框架建构起来，以后的改革主要围绕着这个基本框架的完善健全、新体制因素的成长需要展开。《决定》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提出了相应要求。这个《决定》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指导着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

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全能政府”格局，我国开始了政府机构改革，不断调整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每几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举措和具体目标上都有所不同，但总体方向基本一致，就是明确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职能边界，优化政府职能。多年来，“精简”、“放权”、“转移”、“整合”等等举措使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分明，“全能”转变为“有限”。同时，政府也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努力建立完善和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企改革依旧没有停止，这一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开展大规模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计划，通过股份制、租赁承包等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希望建立起产权关系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拥有科学管理组织制度和企业领导体制的现代企业。在市场机制上，我们国家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努力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价格改革和商品流通体系的改革也在逐步推进。

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正式生产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格局，理论方面再一次实现了新发展。

这个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在相关文件的指导和规划下，农村粮食购销体系发生变化。1993年结束了粮食价格双轨体制，“粮票”退出中国经济舞台，粮食购销市场化变革扩大到全国，各级各类的粮食交易市场建立起来。农业产业化、引导农村过剩劳动力外出工作等也是这一阶段体制转变的特点。

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市场与政府逐渐变为动态融合的关系，不再是静止孤立的。市场机制在农村和城市的地位都有所上升，由“辅助”变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这对中国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无疑是一种肯定。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全面部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以及重点任务。巩固并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金融财税体制、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农村税费改革、国企股份制改革……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协同迈进。

然而，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面临未知的全球经济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市场，在此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是下一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2008年至今，全方位深化改革

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进入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经之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混合所有制”又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并将其定位提升到新高度，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释放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

这一时期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有了突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对中国特色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作出明确阐述，并提出构建“双引擎”的市场经济模式。面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环境，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新发展理念。

二、中国模式推动经济变革的逻辑进路

根据中国走过的四十多年转型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层次性，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安排。在第一、二阶段，是市场经济微观层次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确立时期。在第一阶段里，我们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主要从解决社会问题角度出发实现各种转变。1984年后，我们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实施“价格双轨制”，推动市场价格的形成。在1992年已经基本实现。第三阶段，国企改制成为主线和重点，鉴于之前国企改革陷入困境，国家又通过各种方式调整，同时，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也随之而来。2003年以后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创新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核心环节。因此，我们改革的重点经历了微观层次价格机制的形成、中观层次企业制度的规范、宏观层级经济体制的完善三大阶段，在具体的时期，结合当时实际有不同的微调。

很多学者提到中国转型成功在于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有关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原理，实现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激进转型的模式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也有着不一样的内在逻辑。俄罗斯选择西方转型理论但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失去快速发展的机会，不得不通过自主的改革实践才走出困境。中国在独创模式的推动下成功转型，实现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

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实现发展而进行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并非像俄罗斯那样为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而进行的为新的社会制度建构新的经济制度基础。不同的逻辑结构决定路径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路径选择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中国模式坚持着实际问题导向。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基本国情下，如何进行经济转型是一个重大课题。譬如很多问题争论，我们就是在寻求矛盾的解决途径中找到了较为合理的推动经济平稳变革的动力机制。我国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实际情况相对应的便于继续向前发展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奔着解决问题的制度变革。什么经济问题最突出最需要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突破就从哪里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着经济发展问题导向，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与主要矛盾出发，自上而下稳步推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渐进式策略促进其平稳转型。制度是内生性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一个国家历史越悠久，国家越大，路径依赖就越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充分把握历史传统和中华文明制度特征以及现实情况，没有盲从激进使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而是走“摸着石头过河”道路，在“干中学”推进渐进变革。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各种经济形式同时存在，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不平衡，城乡、地区、不同产业间对改革需求和变革速度都不一样。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使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局部试验开始，从边缘突破，让新体制因素在潜移默化中柔性成长，进而再到制度创新的全面探索、平稳接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某些微观主体的创新行为采取默许的激励形式。一些地方的农民、企业为了解决自身实际问题而进行自发试验、尝试，结果对整个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邓小平强调要对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秉承宽容的态度，允许犯错，有错就改。中国没有武断地采取统一模式推广到全国，而是认可局部创新下的有效措施。

渐进式改革正确处理了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农村后城市、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道路。同时渐进改革的成本相对较小，也避免或减少经济体制转换中引起的剧烈社会震荡、经济通胀，减少社会摩擦、维持社会稳定，保持经济的平稳上升。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内在融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当初盲目跟从苏联模式走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道路，脱离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改革初始，我们深刻反思旧时体制，准确把握历史定位和时代主题，逐步改变市场与政府相割裂的关系，同时发挥社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的优越性，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环境。

改革是一个利益格局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使每个人尽可能获利也是改革的重要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下，我们重组社会利益关系，进行了利益主体的塑造和主体积极性的有效调动，近年来，我们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避免社会矛盾加剧和格局分裂，同时又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机制，成果大大提升。

三、结论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时代工程。回顾中国经济的变革，我们走过了一条从实际国情出发的独特的转变之路。中国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和有经济转型需求的国家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蕴含着富有创造性的中国智慧，也为全球经济学家提供更多研究可能和丰富视角。但也要看到，我们虽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改革没有完成时，我们依旧面临着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经济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依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体制，探索更加有效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赵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实践历程、逻辑进路与未来展望[J].新疆社会科学,2018(5):1-9+162.

[2]刘儒,王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演进的内生性逻辑与基本经验——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8(6):93-100.

[3]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J].长白学刊,2017(2):102-111.

[4]张建君.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与理论创新[J].社会科学战线,2008,(10):82-87.

[5]刘兴赛.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本质、动力、决策模式[J].经济体制改革,2008,(06):5-9.